

□ 郑学富

## 彭德怀撰写发刊词《对症下药》

为办好《调查研究》这个刊物,编辑人员深入基层作社会调查。他们请彭德怀撰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彭德怀题写了“调查研究”四个大字,遒劲有力。

《调查研究》创刊号一篇文章就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为《对症下药——为〈调查研究〉的创刊而写》。据《彭德怀年谱》记载:“1942年4月20日,发表《对症下药》一文,阐述毛泽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要求华北党和军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义。”

彭德怀曾回忆,1928年12月上旬,他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就听他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虽然给我一个印象,很不深刻。1931年有些同志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向大会作报告。会上出现了争议。“左”倾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论”等。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写道:“至1933年,这种‘反狭隘经验论’的讥讽几乎流行得相当普遍。红军政治工作部门的社会调查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就从此每况愈下。到‘五次围剿’时,群众工作传统几乎保留无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时,才又重新恢复,但远不如红军初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

彭德怀在《发刊词》中回顾总结了全

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精确的调查,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有,也是个别根据地。”他还提到了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傅钟、左权、陆定一等,着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解,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是闭门造车,以想象代替实际,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要性,并有具体的分工,在半年内调查长、游、襄、屯、武等六县,但结果除野战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其余都落空了。其原因是: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不够,甚至有空谈主义者所鄙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的,不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文中指出,主观主义不仅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阻碍了许多同志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也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智识的增进。他认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事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

彭德怀写道:“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对症下药。这剂药就是医治主观主义、空谈主义,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他痛感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攻破自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虚心从小学生做起。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地“去做、去学,虽不敢说会学

到、做到如何的成绩,但我坚信只要虚心,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贡献给革命。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子,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学习,群众中有我们的老师。”

## 一群宏才远志的采编人员

《调查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都是有远大志向、文化水平高、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同志。为了使《调查研究》创刊号能够顺利出版,编辑们各自前往调查地点,深入乡村、集市,走访各类家庭,与当地人们进行交谈,考察当地的基本情况。随后,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经济、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自己的调查进行整理,最终撰写成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的创刊号上。

创刊号刊登的第二篇文章是张友清撰写的《几点说明》。张友清,1904年出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21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被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任政治部民运部长。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书记,曾三次入狱、两度被判死刑,他都坚贞不屈。1936年9月,张友清经党组织营救救出狱,先后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室主任等;1942年2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他因长期蹲监狱、戴铁镣,身体瘦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完成繁重的任务。他在《几点说明》中呼吁大力提倡积极的研究精神,必须大胆地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当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具体情况,必须把调查与研究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连载二)



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

□ 钱国宏

## 党的红色电波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声音

## 周恩来领导筹建

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很难传播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偶尔有几份边区偷运过去的报纸、印刷品,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秘密阅读。新华社的文字报道需要用无线电台发报,收讯电台抄收、译出,才能成为新闻稿,数量和影响都有限。中共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刁难和破坏,无法正常出版发行,致使许多重要文献、评论、文章和消息不能与读者见面。早在“西安事变”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就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电台的想法。但由于陕北工业落后等困难,这一设想一直未能实现。

为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为人民服务宗旨,带领全国人民推翻日寇侵略、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创建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窗口和向世界传递声音的喉舌。

## 窑洞上撑起三根树干天线

1939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医治因骑马而受伤的右臂。他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中,商定在延安建立语言广播电台。电台的基本设备,是由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周恩来赴苏治疗期间,经与苏联政府协商,搞到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语言发射机(广播发射机)。1940年3月,周恩来养伤结束后,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和那部苏制功率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拆卸打包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运抵延安。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护送机器回家。途经新疆时,路遇重重障碍,但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均化险为夷,最终使机器安全运抵延安。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指示,决定设立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建工作。中央广播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后,由朱德接任),委员会成员有中革军委三局(通讯局)局长王诤、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在小河南岸的山坡上开凿了三层三排窑洞(两孔石窑和五孔土窑),盖了几间土坯石板房。第一层是利用地面30多米高的山石,挖出了两间大面积的石窑洞。一间作为电源车间,另一间作为广播机房。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引擎发动的燃料则是靠木炭炉供给的一氧化碳;广播机房的正中安置着那台周恩来带回的10千瓦的语言发射机;窑洞的左边,安放着一部500瓦的文字广播发射机,它是中共中央军委三局自己制造的。新华社对国内、国际的电讯是通过这部机器发出去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报请军委三局批准,电台决定了正式播音的方案:新华广播电台每周广播三次,每次广播是在当日的下午和晚上,同时用国语和日语各广播一次。在语言广播的同时,用国际通码向世界各国播发新华通讯社电讯。没有铁制的天线立杆,工作人员就用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埋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

这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电波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广播电台取名为“新华”是为了与新华通讯社相一致,共同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喉舌。它的呼号为CXR,其中C是指英文“中国”(China)的第一个字母,X是英文“新华”(Xinhua)的第一个字母,R是英文“电台”(Radio)的第一个字母。

(连载一)

## 见证中原解放区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中州市

□ 李奎清

## 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州市

解放区各地的中州农民银行最初大多是与工商管理局合署办公,工商管理局长兼任各地中州农民银行正副经理,后来还同贸易公司合署办公,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截至1948年底,中州农民银行总行直辖管理的有郑州、开封、洛阳、许昌分行和白城办事处,分辖管理的分支行有豫皖苏分行、豫西分行、桐柏分行、江汉分行、陕南分行,所辖县级以上机构有116个。

1948年5月间,野战军前委下达《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指示》,要求“中州市的发行,分试发与普及两个阶段,即是由点到面,由城市到农村,有步骤地开展”。5月20日,沙河沿岸和平汉路西部最早开始发行中州市,标志着中州农民银行(简称“中州市”)开始正式发行。由于时间仓促,这时候虽然已发行货币,主要有贰元、叁元、伍元、拾元等七种券别。但总行及各地的银行机构还未建立,只是在各部队设立了随军兑换所,负责进行货币兑换。中州市解放区各地开始正式流通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指示,要求在解放区各地建立银行机构,确保解放区的金融秩序。

中州农民银行发行壹元以上的各种票面是委托华北解放区冀南区帮忙印制,角票和分票则是由安徽省首新鑫石印馆承印,面值为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后来在河南鲁山县白象店村成立了中州农民银行第一造币厂,主要印制中州市伍元券和拾元券。当时的解放区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经济封锁,纸张、油墨等原材料十分匮乏,解放区政府动员和组织进步商人,利用中州农民银行所兑换的法币、银元、黄金,到上海等地购进油墨和道林纸,确保了印制中州市的原材料供应。中州市印制好后,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准后,才能移交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为驱逐法币等货币,发行本市,中共中央中原局采取了随时兑



中州农民银行拾圆券

换银元、禁止法币流通、财税政策支持、开设国营商店、打击假币等多种措施,鼓励解放区人民使用中州市。到了1949年初,金圆券在中原解放区已基本肃清,中州市成为解放区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货币。

中原解放区江汉区域对中州市的发行,始于1948年8月下旬,当月中旬江汉区行成立。1948年夏天,江汉军区为适应解放区经济的需要,在随县(今湖北随州)黄木塘建立中州市印票厂,同年12月,为应对“反扫荡”的斗争形势,印票厂迁至钟祥市张集镇与客店镇之间山高地密、人烟稀少的唐家河山洼。印票厂设有石印、完成、会计三个股,加上警卫排共有150余人。按照分工,石印股负责印刷票,完成股负责打号码、盖印章和清点成捆,会计股负责复核清点、登记账簿和保管上解。印票厂行政上属江汉军区负责,业务上归江汉行署管理。

1949年春节前,江汉军区一分区和地委宣传部曾组织撰写多幅春联送给群众,其中一幅给予中州市极高的评价,也宣传了解放区的金融政策:“胜利在望中州市信用百倍;垮台有日金圆券不值一文。”横批:“稳定金融。”

## 中州农民银行完成历史使命

1948年9月3日,江汉地区行署为进行反掠夺

的经济斗争,在中州市流通后,通令本地区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市场交易计价一律改以中州市为统一结算单位,在集市交易所、商协会和工会等首先采用。对原来使用旧法币、银元、冀南币计价的商品均改为中州市计价,兑换时不收手续费。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标志着中共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先设在石家庄,后迁至北京,辖东北区行、华北区行、西北区行、中南区行及它们所属的省市行署分行及县支行,成为中共全国金融的总行。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逐步把各解放区银行改组为区行、分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并按不同比价逐步回收各解放区原来发行的各种货币,使人民币基本上成为全国解放区统一流通货币。

1949年3月10日,人民币开始在中原解放区发行,由于人民币不足以开拓市场,票券品种也十分单调,小额票尤其缺乏,为了增加中州市的支持力量,续印了几种小额票,以弥补人民币的不足。后来随着人民币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州市遂停止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以3元折收旧人民币1元的比价收兑中州市。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兼理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业务,中州农民银行各地分支县行兼理各地分支县行业务,各级中州农民银行经理、副经理兼任各级人民币经理、副经理职务,实行对外两块牌子,对内一套班子的办法。

1949年5月中旬,银行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接管官僚资本银行。12月2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发出的《决定统一名称办法的通知》,中州农民银行走完了由区域性银行向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过渡历程,开始其新的历史使命。

(连载二·全文完)

## ·丝路览胜·

## 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

□ 曹鹏雁

尾追之敌发生战斗。

镇政府大院外的原广佛寺三眼洞雕塑为南北朝时遗物,上坝清凉寺为明代石窟寺。江洛出土有汉代、宋代墓葬文物。

悟真山是境内文化名山,有创修自明代嘉靖年间的中华庵等殿宇,遗存石碾盘、石碓窝、石佛像、石香炉等石雕及重修悟真山工程告竣序)石碑。

江洛镇公办学校起源最早为民国版《徽县新志》:“江洛镇义学,在县西八十里。光绪六年(1880年)知县李裕泽建。”清代末期另有“八义学馆”。民国五年至二十一年期间在第三学区的江洛、游龙各有初级小学1所,此后在江洛设有中心高等小学1所。民国二十四年,又设短期义

## 徽县江洛镇

江洛镇位于徽县城西35千米处洛河河谷,解放前旧称江洛坝,民间有江喇叭的俗名,隶属股所。解放初设江洛区,辖江洛、泥阳等乡。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记载可知,泥谷古地名指今泥阳镇泥阳川,泥水上游即流经江洛的洛河。

1920年海原大地震发生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主持兴修天水通往陇南14县的大车道。1922年秋,自天水县(今秦州)南经齐寿山、娘娘坝、大山坝、麻沿河镇、江洛镇、游龙川、徽县到两当修通了马车道。由此,自江洛通往徽县城始有了过游龙川的马车道,江洛镇开始显露徽县西境的交通区位优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华双公路全线通车,加上后来拓修提升为316国道线,与自江洛修通的江武公路,江洛镇始为徽县西境的一个交通早码头,极大促进了江洛繁荣发展。

1935年10月1日,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一部4000余人经泥阳至江洛,在河东雷神堡与来自成县的



务小学1所。1957年,徽县在江洛镇新建中学,1958年改名为徽县第五中学。2007年6月,在游龙村建成新时代农民文化活动大院一处。

江洛高跷、云雷舞、羊皮鼓舞在徽县社火中颇具地域特色。江洛食醋口感纯正,金皮老豆腐柔香筋道。这两样地方特产为江洛镇自民国初年开始,成就了名满陇右及周边地区的特色面食棒棒面。

栗川地名因水而来,栗川河为发源于北部山区坞峡的雪水河、仇坞水,自北而南流入木皮岭北麓的一片宽阔谷地。陇右方言谓东西走向曰横,南北走向曰立。与成县东境自西向东横流淌的横川相对而言,徽县西境自北向南纵向流淌的这条河流便有立川之称。又因古立川谷地周围林木茂盛,遍生栗树,居民可资,故而秦汉以来立川逐渐被乡民演绎为栗川。因所在地川原南北走向(立向)与东西走向的横川相对得名“立川”,后衍名为“栗川”。

遗迹主要有唐代杜公祠、元观映“少陵钓台”、南镇院、栗川塔塔、郃庄古银杏树、侯家坝清代徽酒作坊、拧拧柏树等。

(连载九)